

春秋公羊傳

語言研究

姚堯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春秋公羊傳

語言研究

姚堯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春秋公羊傳》語言研究/姚堯著.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309-09666-8

I. 春… II. 姚… III. 《公羊傳》-古漢語-研究 IV. H1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81678 號

《春秋公羊傳》語言研究

姚堯 著

責任編輯: 宋文濤

出版發行: 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國權路 579 號

郵編: 200433

網址: <http://www.fudanpress.com>

電子信箱: fupnet@fudanpress.com

郵購電話: 86-21-65642857 (門市零售)

86-21-65118853 (團體訂購)

86-21-65109143 (外埠郵購)

常熟市華順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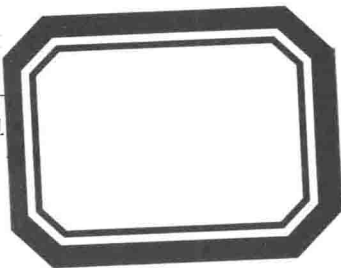
開本 787×960 1/16 印張 18.75 字數 310 千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666-8/H·207

定價: 35.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向復旦
版權所有



本書由江蘇省教育廳2012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編號2012SJB740027）
蘇州大學“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經費資助出版



Contents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1.1 選題緣起與預期目標	(1)
1.2 《公羊傳》經傳注疏綜述	(2)
1.2.1 《春秋》與《公羊傳》	(2)
1.2.2 何休《解詁》	(5)
1.2.3 徐彥《疏》	(6)
1.3 《春秋公羊傳》研究成果	(6)
1.3.1 古代學者研究要籍	(6)
1.3.2 近現代學者研究成果	(8)
1.4 《春秋公羊傳》語言特點及語料價值	(10)
1.4.1 對《春秋》經文的闡釋	(10)
1.4.2 傳文本身的語言特點	(11)
1.4.3 對後代語言的影響	(13)
1.5 研究方法	(14)
1.5.1 描寫與個案考察相結合	(14)
1.5.2 內部語料與外部語料相結合,共時比較與歷時 比較相結合	(15)
1.5.3 傳統語文學闡釋與現代語言學理論相結合: 本書的理論準備	(15)
1.5.4 古籍翻檢與電子語料庫檢索相結合	(16)
1.6 版本說明	(16)



第二章 《公羊傳》中的複音詞	(18)
2.1 概述	(18)
2.1.1 複音詞的判定標準	(18)
2.1.2 《公羊傳》複音詞概況	(20)
2.2 聯合式複合詞	(22)
2.2.1 同義聯合	(22)
2.2.2 相關聯合	(24)
2.2.3 反義聯合	(26)
2.3 主從式複合詞	(27)
2.3.1 偏正式複合詞	(27)
2.3.2 動賓式複合詞	(32)
2.3.3 主謂式複合詞	(34)
2.4 句法結構式複合詞、跨層結構式複合詞	(35)
2.4.1 句法結構式複合詞	(35)
2.4.2 跨層結構式複合詞	(41)
2.5 單純詞和重疊式複合詞	(42)
第三章 來源於《公羊傳》的典故詞	(45)
3.1 概述	(45)
3.2 典故詞個案研究	(47)
3.3 來源於《公羊傳》的典故詞的特點	(73)
3.4 典故詞的詞彙化	(76)
3.4.1 詞彙化的定義與內涵	(76)
3.4.2 典故詞的詞彙化路徑	(77)
3.4.3 典故詞詞彙化的特點	(81)
3.4.4 典故詞詞彙化的動因	(84)
第四章 《公羊傳》中的方言詞	(86)
4.1 概述	(86)
4.1.1 《公羊傳》方言詞概況	(86)
4.1.2 齊方言研究及《公羊傳》“齊人語”的性質	(87)
4.2 方言詞個案研究	(88)



第五章 《公羊傳》中的代詞	(117)
5.1 概述	(117)
5.2 第一人稱代詞“我”、“吾”	(117)
5.2.1 概述	(117)
5.2.2 “我”、“吾”的分布情況	(118)
5.2.3 “我”、“吾”辨析	(125)
5.3 近指代詞/繫詞“是”	(130)
5.3.1 概述	(130)
5.3.2 《公羊傳》中的“是”	(130)
5.3.3 “是”的語法化	(132)
5.3.4 “是”與“此”的異同比較	(138)
5.4 泛指代詞/句末語氣詞“焉”	(139)
5.4.1 “焉”非兼詞	(139)
5.4.2 《公羊傳》中的“焉”	(142)
5.4.3 “焉”的語法化	(148)
第六章 《公羊傳》中的介詞和連詞	(151)
6.1 概述	(151)
6.2 介詞“于”、“於”、“乎”	(152)
6.2.1 概述	(152)
6.2.2 介詞“于”	(153)
6.2.3 介詞“於”	(159)
6.2.4 介詞“乎”	(164)
6.2.5 介詞省略	(170)
6.2.6 “于”、“於”、“乎”的異同比較	(174)
6.3 介詞/連詞“以”	(177)
6.3.1 動詞“以”	(177)
6.3.2 介詞“以”	(178)
6.3.3 連詞“以”	(195)
6.4 介詞/連詞“及”、“與”	(201)
6.4.1 概述	(201)
6.4.2 介詞/連詞“及”	(203)



6.4.3	介詞/連詞“與”	(207)
6.4.4	“及”、“與”的異同比較	(211)
第七章	《公羊傳》中的疑問句和疑問詞	(216)
7.1	概述	(216)
7.2	特指問	(216)
7.2.1	概述	(216)
7.2.2	原因疑問詞“曷爲”、“何以”、“何”	(217)
7.2.3	人物/事物疑問詞“曷”、“何”、“孰”、“誰”	(227)
7.2.4	方式/情狀疑問詞“奈何”、“何如”、“如……何”	(233)
7.2.5	處所疑問詞“惡”	(238)
7.3	是非問與選擇問	(240)
7.3.1	概述	(240)
7.3.2	句末疑問語氣詞“乎”、“與”	(240)
7.3.3	疑問副詞“其”、“其諸”	(244)
第八章	《公羊傳》語言研究與《公羊傳》的整理和專書詞典編纂	(251)
8.1	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	(251)
8.2	中華書局《春秋公羊傳譯注》	(261)
8.3	上海古籍出版社《春秋公羊傳譯注》	(267)
8.4	《春秋公羊傳詞典》	(277)
	參考文獻	(285)
	後記	(293)



第一章

緒論

1.1 選題緣起與預期目標

《春秋公羊傳》(以下簡稱《公羊傳》)是儒家“十三經”之一,是上古時期一部重要的歷史典籍,也是集中闡釋《春秋》“微言大義”的重要文獻,自其寫定伊始,即在統治集團和傳統學者間享有崇高地位,世代流傳有序,迄今仍是中國經學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公羊傳》在闡釋《春秋》時,多使用語詞訓釋、句法分析的方式,涉及經文語言的語音、語義、語法、修辭等各方面內容;同時傳文本身亦可獨立成篇,其語言帶有特定的時代、地域色彩,並對後代書面語言產生了深刻影響。因此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它也是對上古漢語和漢語史研究極具價值的傳世文獻。

對漢語數千年來發展演變歷史的全面了解,有賴於對各個共時平面語言現象的描寫和解釋,而共時平面的研究,亦即斷代的語言研究,又必須以專書研究為基礎。對漢語史上具有代表性和重要價值的文獻進行專書語言研究,無疑是深入、全面探討漢語通史上一些重要課題的基本途徑。

基於以上兩點認識,我們認為,寫定於秦漢之際的《公羊傳》,一方面繼承了先秦的經典文獻語言,並有意或無意地對其進行着語言學方面的解釋,有着初級的、尚不成體系的語言學觀念,另一方面又帶着鮮明的時代印記,並深刻影響着兩漢、魏晉時期的書面語言,正是一部在漢語史上具有重要承上啓下意義的專書,可資學者深入了解這一時期的語言現象。

本書的研究,旨在以描寫為基礎,由點及面,對《公羊傳》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詞彙、語法現象進行個案研究,考察其來源、發展、異同,以及對前代語言的繼承和對後代語言的影響。點面結合的調查和研究,能較全面、深入地反映《公羊



傳》的語言現象，從而對秦漢時期語言斷代研究有所裨益，為漢語通史研究提供材料依據，並能有助於今後的古文獻整理和詞典編撰。

1.2 《公羊傳》經傳注疏綜述

1.2.1 《春秋》與《公羊傳》

《春秋》是在魯國史記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至於其修訂者，雖然古今學者對於孔子與《春秋》的關係多有爭論，但“先秦至漢多種古籍關於孔子修《春秋》的記載，應承認為可信”（李學勤 1998）。僅《公羊傳》中就多次明言孔子修《春秋》。《春秋》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公羊傳》：“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又莊公七年：“夜中星孛如雨。”《公羊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孛如雨。’”又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傳》：“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公羊傳》中提到的“修《春秋》”、“為《春秋》”的“君子”，皆指孔子。文中亦有直言“子”者，如《公羊傳》昭公十二年：“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何休注：“此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我們在此也接受《公羊傳》和公羊學家的觀點，認為孔子修《春秋》是有文獻依據的。

關於《公羊傳》的授受源流，最常見的說法是源於孔子晚年門生子夏，傳於公羊氏，由公羊壽和胡毋子都寫定。《春秋》隱公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羊傳》：“紀子帛者何？無聞焉爾。”何休注：“《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何休《公羊傳序》徐彥疏：“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又引戴宏序：“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孔子知秦將燔詩書之說固不可信，但戴宏與何休的觀點相近，何休在《序》中亦以戴宏為“先師”，他們的觀點源流略同。

《孝經鉤命訣》記載：“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參即曾參，商即卜商，字子夏。又《春秋說題



辭》：“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譏緯之說雖多附會假托，不可盡信，但此說與當時經學家的觀點無大區別，可能是東漢時代經師的普遍看法。

也有學者對此提出了異議。元人郝經在《春秋三傳折衷》的序言中提出，《公羊傳》中有引孔子、高子、子司馬子、子女子、沈子、魯子說，但“《公羊》終篇非惟不及子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高弟皆不及焉”。但這不能作為完全推翻子夏傳授說的證據。自子夏至公羊壽，時代已歷三百餘年，其間傳授《公羊》學說的經師必不止以上提到的數人，其學說由歷代經師增成，不盡出於子夏，亦不可怪。而從後人的記載中可見子夏對《春秋》頗有心得，如《春秋繁露·俞序》：“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擯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韓非子·外儲說右》、《說苑·復恩》等皆引用過子夏關於《春秋》的教益，與董仲舒、司馬遷及東漢儒生論《春秋》多有相近之處，不能以《公羊傳》中未提及子夏便輕易否定他的傳授。

當然，亦不能簡單認為孔門弟子傳《春秋》者僅子夏一人，《春秋繁露·俞序》除了子夏還提到：“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也說：“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春秋》在流傳過程中，經過歷代經師整理講授，在寫定之前，其學說來源必不僅限於個別人物。

《漢書·藝文志》著錄《公羊傳》十一卷，並注明：“公羊子，齊人。”顏師古注：“名高。”公羊高固為《公羊傳》傳人，但《公羊傳》文本非出自子夏的弟子公羊高之手，而是其後人公羊壽所寫定，成書於西漢初文、景之際。這從文本中可得證明。《公羊傳》哀公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左傳》“開陽”作“啓陽”。何休注：“開者，為漢景帝諱也。”又哀公六年：“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愿諸大夫之化我。’”陳乞之子即陳恒，因避漢文帝諱而改“恒”為“常”。這是《公羊傳》成書年代的明證。

但公羊學說早在此前就由孔門弟子口授傳播。《公羊傳》與《孟子》有共通之處。劉師培《公羊孟子相通考》（見《劉師培全集》第一冊《群經大義相通論》）提出二者義合者七條。其中《孟子·告子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與《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表述方式相近。又《離婁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與《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



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文多同。

《公羊傳》與《荀子》也有密切的關係。楊倞注《荀子》多引《公羊》文，而何休解詁又多用《荀子》文。《荀子·王制》：“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與《公羊傳》僖公四年“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相近。又《王制》中提到的“桓公劫於魯莊”，來源於《公羊傳》莊公十三年所記錄的柯之盟中曹沫劫齊桓公之事，此事《左傳》無記載，《穀梁》敘述簡略，可見它可能本於《公羊》。又《大略》：“《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來源於《公羊傳》文公十二年：“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爲能變也。”又：“《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來源於《公羊傳》桓公三年：“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

《韓非子》中也可看出《公羊傳》的影響。《十過》述晉獻公與荀息謀假道於虞以伐虢之事，其文多與《公羊》、《穀梁》合，而《左傳》的記敘則簡略得多。

《禮記》多記錄孔門弟子遺言，其中頗有與《公羊》相通者。廖平《何休公羊解詁三十論》卷一“王制爲春秋舊禮傳論”條說：“孔子作《春秋》，存王制，《禮記·王制》乃《春秋》舊傳，孔子既作《春秋》，復作此篇，以明禮制，故所言莫不合於《春秋》。”《王制》是否爲《春秋》舊傳姑且不論，但《禮記》與《公羊》多通則不可否認，可能二者在口授流傳過程中共同吸收了某些學說。如《曲禮下》：“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又《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多與《公羊》文同。《禮記》中也有直接引用《公羊》義者，如《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鄭玄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此《春秋傳》即《公羊傳》宣公十八年：“吳、楚之君不書葬。”

因此段熙仲先生(2002:31)說：“夫七十子既喪，孟、荀俱爲大儒，其說經多與公羊家之言合若符節；又其書文字亦均有與《公羊傳》文同者，亦足以明《公羊春秋》爲孔門所傳之學，公羊先師之說必有所受之，而非後來師說之所能造作者矣。”從以上敘述可見，《公羊傳》來源於孔門弟子，寫定於漢初，是可以確定的。

如同子夏並非唯一受《春秋》的孔門弟子，《公羊傳》也並非公羊氏一家之學。《公羊傳》中稱引經師言論共十五條，涉及七人。其中的“子公羊子”當指公羊高，因爲寫定者公羊壽當無自稱“子”之理。另有“魯子”，被引用六次，“子沈子”，被引用三次，除此之外還有“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高子”，各被引用一次。由此可見傳文吸收了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四庫提要》所說：“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



1.2.2 何休《解詁》

《史記·儒林傳》提到胡毋生、董仲舒分別以《春秋》教於齊魯和趙，孝景時俱為博士。此二人是漢代公羊學的發端和代表人物。其後傳者甚眾，《史記》、《漢書》和《後漢書》的《儒林傳》皆有記載。其中最著名的，也是對公羊學傳承起了至關重要作用的，是東漢中葉的何休。王鳴盛《蛾術編》卷七“公羊傳疏”條甚至盛贊道：“無休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也。”

《後漢書·儒林傳下》記錄何休“為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李育受《公羊》於何家於史無徵，但在《後漢書·儒林傳》中與嚴彭祖、顏安樂二家分列，可能別有所本。而史籍中唯一提到的何休的業師羊弼於《後漢書》無傳，其事跡已然湮滅，何休的學術淵源也因而不能清晰查考。何休於《春秋公羊解詁》中亦未曾明言他所據何本、所用何說，但曾於序中說：“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轉違戾者。……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①又說：“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據此推測，何休的學說或避各家所短，兼各家所長，甚至直承西漢初的胡毋氏。段熙仲先生（2002：14—22）以翔實的考證論述了何休所據文本與嚴、顏二家、漢石經及董仲舒所據皆不同，其學說亦不同於嚴、顏及董，蓋用胡毋子都本。

何休在《解詁》中常以陰陽災異、緯候圖讖解釋史實，時為後人所詬病。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卷二“公羊注引緯”條詳細列舉了何休注中引用緯書的內容，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十亦有條目專門總結“何注用緯書者”十餘條。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春秋公羊傳解詁十二卷”條提到：“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如《公羊傳》成公八年：“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何休注：“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又哀公十四年：“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也。”何休引出“端門血書”之說，言道：“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春秋》之為

① 徐彥疏：“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由疑惑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何休雖未明言，但徐疏點明了“甚可閔笑者”乃嚴、顏之徒。



漢作，固然純屬附會，然此亦非何休首創，而是當時時代風氣使然。蘇軾《論春秋變周之文》（見《東坡全集》卷四一）稱：“三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識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這樣的說法未免失之偏激，何休對《公羊傳》傳承的重要貢獻，是無可置疑的。

1.2.3 徐彥《疏》

十三經注疏本《公羊傳注疏》題“唐徐彥疏”。《四庫提要》提到：“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又引董道《廣川藏書志》：“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並認為：“考疏中邲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勛《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這是過去較通行的一個說法，及至一些今人著作，如劉尚慈先生《春秋公羊傳譯注》亦承襲之，認為徐彥是唐人。

但很多學者不同意唐人說。王鳴盛《蛾術編》卷一“唐人尚書等疏承襲前人”條認為“《公羊》出徐遵明”，徐遵明乃魏末大儒，阮元《公羊傳》校勘記序同意此說，認為“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為者”。洪頤煊《讀書叢錄》卷六“公羊疏”條亦提出：“疏中引《爾雅》孫炎注、郭璞《音義》、《書序》、《長義》、《孝經疏》之類，皆唐以前本。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亦六朝時有之，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此疏為梁齊間舊帙無疑。”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公羊疏後”條進一步提到：“東晉有徐彥……而疏中引及劉宋庾蔚之，則非東晉人。……齊梁陳隋唐無此官制（即三府掾），惟北齊有之，則此疏北齊人撰也。”其考證頗有理據。段熙仲先生（2002：26）總結分析了上述這些意見，並從疏中尋找內證，認為徐彥“其人既下不逮隋，上不過宋，則為南士當在齊梁以降，北人則在北齊之世矣”。是故仍當將徐彥視為南北朝時代人物為宜。

1.3 《春秋公羊傳》研究成果

1.3.1 古代學者研究要籍

魏晉以後，《左傳》以其更詳備的史實和更高的文學性被學者贊譽，日益見

重,《公》、《穀》則漸居下位,這也與今文經學的整體衰落相伴。如《北史·儒林傳上》所說:“《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到了唐初,根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更是到了幾乎無人傳習的地步:“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劉知幾《史通》卷十八“雜說十條”其三:“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掛壁不行,綴旒無絕。”

然而對於《公羊傳》的研究,始終未曾中斷。《新唐書·儒學傳下》記載,唐天寶末年,啖助“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逢稔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且“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弟子陸淳作《春秋集傳纂例》和《春秋集傳辨疑》二書,釋其師說。啖助考證《春秋》三傳得失,主張廢傳說經,其說多別出心裁,異於先儒,有啓人耳目者,亦多臆斷之處,實開啓了宋人舍傳求經之先路。

宋元時期專治公羊學且有影響者罕見於世,而匯通三傳、排比經義的著作不少。較有影響的有葉夢得《春秋傳》、《春秋考》、《春秋讞》,吳孜《三傳折衷》,王應麟《春秋三傳會考》等,多議論三傳得失,且主張信經而疑傳。元末明初的趙汭於《春秋》用力至深,著作中最爲稱道者爲《春秋屬辭》,以杜預的《春秋釋例》爲本,敘述《春秋》義例,又多補正,《四庫提要》稱其“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爲多”。

清代是《公羊傳》和公羊學復興的時期,出現了不少重要的注解、研究著作。乾隆年間,孔廣森“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見《公羊春秋經傳通義》阮元序),作《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在《敘》中,他提出了破今文經學家法,“輒因原著,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室,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的主張,並認爲“《公羊》、《穀梁》、左丘明並出於周秦之交,源於七十子之黨,學者固不得而畸尚而偏詆也”,表示今古文不可偏廢。他拋棄何休的三科九旨、黜周王魯等理論,雖被批評爲“進退失據”(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但他先審音識字、後辨章句以通經的研究方法,以及破除門戶之見吸收各家之長以正確理解經義的研究理念,是公允可取的,對後學者有很大幫助。凌曙的《公羊禮疏》、《公羊禮說》、《公羊問答》,陳立的《公羊義疏》等,也採用這種方法。尤其是陳立,“博稽載籍,凡唐以前《公羊》大義,及有清諸儒說《公羊》者,左右采獲,擇精語詳,草創三十年,長編甫具”(見《清儒學案》卷一三一《凌曙學案》)。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整理和辨析方面成績斐然,爲後代研究者提供了極爲豐富和翔實的材料。

與此相對,嘉慶年間,劉逢祿師承其外祖莊存與,作《公羊何氏釋例》和《公羊

春秋何氏解詁箋》等，“善持論，能文辭，探源董生，發揮何氏，尋其條貫，正其統紀”（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他恪守今文經學傳統，嚴立公羊門戶，尊奉何休旨趣，可謂清代今文經學的大家。他將公羊體例總結為“張三世、通三統、譏、褒、貶、誅絕、內外、災異”等，是關於《公羊傳》較系統的、理論性的、融會貫通的闡釋。受他啓迪的龔自珍、魏源等人的公羊學研究，主要側重義理，更以此為出發點表達了與當時時代背景聯繫在一起的政治理想。

清末值得注意的是王闡運的《春秋公羊傳箋》，他主張拋開前人傳注，直探經文本義。他於傳文下先列何休《解詁》，後列個人箋注，與何注多有異趣，甚至不乏質疑傳文，或於無傳處補充己意的。這一方面可啓人耳目，幫助讀者跳脫窠臼，直指經義，但另一方面會造成解經的隨意性。且其書言簡語概，論證不詳，不甚便於吸收和引用。

除此之外，惠棟《公羊古義》、姚鼐《公羊傳補注》、俞樾《春秋公羊傳平議》、陳奂《公羊逸禮考征》、何若瑤《春秋公羊注疏質疑》等著作，都是研究《公羊傳》的重要參考資料。

另外，作為儒家十三經之一，《公羊傳》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必讀典籍。很多學者雖然並不專治《公羊》，但仍然積累了許多富有見地、可資參考的讀書劄記。如王應麟《困學紀聞》、黃震《黃氏日鈔》、顧炎武《日知錄》、何焯《義門讀書記》、王鳴盛《蛾術編》、臧琳《經義雜記》、宋翔鳳《過庭錄》等學術著作中，皆有討論《公羊傳》的專門章節或條目。

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則有淳于鴻恩的《公羊方言疏箋》，申說了何休和徐彥對《公羊傳》中方言詞語的闡釋，雖然篇幅不長，但折衷諸說，多有創見，本書在方言研究一章中多次稱引其意見。除此之外，沈齡《續方言疏證》也有多條探討《公羊傳》方言詞語的內容。王引之《經義述聞》、洪頤煊《讀書叢錄》、陳鱣《簡莊疏記》等著作中也有專門討論《公羊傳》訓詁、經義、校勘的章節，可資參考。尤其是王氏父子，旁徵博引先秦秦漢各類經典著作，研究眼光敏銳，發前人所未發，多有能冰釋讀者疑竇的真知灼見。

1.3.2 近現代學者研究成果

20世紀以來的《公羊傳》研究稱不上繁榮，但亦不乏力作。楊樹達先生的《春秋大義述》排比《春秋》綱義，並分類繫以經傳，鑒於國難，以“榮復讎”、“攘夷”開宗明義，並條分縷析，對研究《公羊傳》義理有很大幫助。

段熙仲先生的《春秋公羊學講疏》，對《公羊傳》授受源流、體例、史實、詞語運



用、微言大義以及公羊學的歷史等作了詳細論述，完整地介紹了春秋公羊學的理論體系。他不贊成“傳不破經、疏不破注”的舊規，考證精密，時下己論，語多精當。本書在多處引用了他的觀點。此書餘論部分的“《公羊》古義輯”輯錄了《禮記》、《韓詩外傳》等十九部兩漢時期典籍所引《公羊》義，為後學者研究這些典籍與《公羊傳》的關係，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傅隸樸先生的《春秋三傳比義》以《春秋》經文為綱，逐條排比《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的異同，辨析細緻，考證嚴謹。不過他多宗《左傳》，常常依《左傳》例斥《公》、《穀》之荒謬，則是未注意到後二部傳文內部的義例與思想的統一性，強將不同來源的三部文獻統一化，以史實或現代人眼光苛責《公》、《穀》，便不能避免一些偏見。

除了公羊學研究著作，《公羊傳》的整理、注解本也是重要的研究成果，這包括計碩明萬有文庫本《春秋公羊傳》，李宗侗《春秋公羊傳今註今譯》，王維堤、唐書文《春秋公羊傳譯注》，孫玉坤《春秋公羊傳》，馬志偉、金欣欣《評析本白話公羊傳》，葛根貴《春秋公羊傳直解》等。今人的整理注釋雖便於現代人通讀古籍，但多雜糅古人注疏，缺少辨析，常會造成義例不一，考證不密，甚至以訛傳訛，在研究中須謹慎對待。

2010年出版的劉尚慈先生的《春秋公羊傳譯注》是最新的《公羊傳》整理、研究著作，吸收了不少既有成果的精華，避免了前人的各種訛誤，可謂今人整理注譯本中最善者。這部著作對人名、地名、事件、禮制等的闡釋事無巨細，並參以《左傳》、《穀梁傳》、《史記》等對史實作了大量補充，為閱讀帶來了方便。稍感缺憾的是，詞、句意義的解釋說明相對較少，論證比較簡單。

另外，呂振端先生著《漢石經公羊傳殘字集證》利用石經文字來校勘傳世文獻，有一定參考價值，但因石經殘缺嚴重，多不連貫，祇能起到輔助材料作用。

除了上述著作，近年來關於《公羊傳》的研究論文數量不多，且多側重經學史和思想史的討論，與《左傳》研究的洋洋大觀不可同日而語。語言學方面的討論，關於詞彙的有王海棻先生《〈公羊〉〈穀梁〉中有“稱”義的詞》、鄧軍先生《〈公羊傳〉正文訓詁新探》等。關於語法的有王海棻先生《〈公羊傳〉的幾個語法問題》、《〈公羊傳〉〈穀梁傳〉疑問詞語的比較研究》、孫良明先生《中國語法學的萌芽——〈公羊傳〉解說“春秋書法”表現出的語法結構分析》、嚴修先生《論〈春秋公羊傳〉的語法觀》、任遠先生《中國語法學之萌芽——試論〈公羊〉〈穀梁〉的語法研究》、萬獻初先生《〈公羊傳〉疑問代詞的特點》，以及貢桂勇博士的一系列文章等。關於方言的有汪啓明先生《先秦兩漢齊語研究》和華學誠先生《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中